

新民晚报

初见康濯先生时,他鬓白,枯瘦,因个高而背略驼,在我的印象中完全是一个老人的形象。其实他当时还只有五十多岁,不过是在少年的眼光中提前成为了一张老照片。他投身学潮的故事,奔赴延安的故事,在晋察冀边区出生入死的故事……在后辈看来都足够遥远,无疑增加了这张老照片的模糊度和沧桑感。

忆康濯先生 韩少功

大概是要延续自己烟友的身份,拉近与老友们的距离。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正值新时期文学的破冰时期。想必是湖南省“第一大鬼鬼”的受害经历,给他留下了对“文革”的切肤之痛,他在随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挺身而出,勇倡改革和开放,常有惊人之议,成为老干部群体中的少数异类之一,因此也获得大批新锐中、青年作家的尊敬和拥戴。我的短篇小说《月兰》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因是一篇表现乡村生活的悲剧故事,被台湾和前苏联的媒体转载,引起了舆论界激烈的争议。先生对此事似乎比我还着急。据说他在好几次会议上为这一个作品辩护,又私下约我商议对策,还主动给我续

写了上千字,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以免我横遭可能的政治批判。我不大理解他那颗小脑袋里捣腾的政治经验,不觉得这个“光明的尾巴”有多好,而且随着时过境迁,管制尺度进一步宽松,这种文字防身术也逐渐变得多余。但他当年心急如焚“护犊子”,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代笔疾书那一幕,仍是我心中恒久的温暖。在他的力推之下,这篇作品获得省里一项重奖,算是对它在全国评奖中呼声甚高、却最终因争议而落选的一种弥补。我后来才知道,他原名毛季常,出生于原湘阴县(现汨罗市)的毛家河,与我知青时代的务农之地同属一县,甚至相距不过数里。这使我后来读他的《水滴石穿》《我的两家房东》等作品时就多了几分亲切感,多了不少有关气味和声音的想象。我与他一同去北京参加会议,同住一室(当时大家都习惯于这种多人合住的节俭制度)时,还聊过不少汨罗江边的掌故。他说到家乡的姜盐茶,说到家乡的红薯粉和糯米粑,一句句都拨动了我的青春记忆。他还说到家乡人为什么把上厕所以说成“解手”——这是因为以前湘楚之地战乱频繁,战俘和囚犯多,上路迁移总是被严加捆绑,以一长绳连成串,其中缚两只胳膊为“大绑”,缚一只胳膊为“小绑”,只有到上厕



富有生命力的一本新书

丁景唐



《文学的生命——我和我的作家朋友》封面上是作者修晓林的头像,书里大32开本,非常有中国气派的大书,我很赞赏,向晓林祝贺出了一本有生命力的著作!扉页上,承晓林深情厚意写着:“景唐先生惠正,岁月凝深情,成功在今日!”我受到感动,还受到激动!三十年的时间,55万字,写了91位作家朋友,有父辈级的,有平等级的。每篇文章都有作者与作者的合影,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对作家朋友的深情厚谊,那么亲切,那么美好。这是一本文字美妙的图书,富有史料和文献价值,可以补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献史。时间是它的生命力的保证,它是一本生命力旺盛、生命力强壮的好书。《文学的生命——我和我的作家朋友》生命的灿烂花朵是开不败的永恒的鲜花!

(2016年11月21日于上海华东医院19楼病房)

“冬至腌肉,小寒腌鱼”,这是故乡流传下的习俗。

又到腊月腌鱼时

石歌

老家地处江南地区,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大小河塘里,鱼类丰富。每到冬至时节,成筐成篓的鲜鱼摊满街市,鳊鱼、鲢鱼、青鱼、草鱼、鲤鱼、鲫鱼……应有尽有。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家里每年腌制咸鱼干。母亲是腌咸鱼的高手,每年冬至过后,她每天大清早就起床来到农贸市场,在每个鱼摊前转悠,看到便宜的小鲫鱼、草条鱼、火眼郎等杂鱼,她就买回家,倒在木盆里,放入清水养上半天,让鱼在游荡中吐尽肚中杂质,接着,母亲在冰冷的凉水中,把杂鱼一条条除鳞,清除内脏,放在竹筛中晾晒两个小时,然后放入缸中,撒入细盐、胡椒粉、姜片和葱花,腌制三四天后,捞起来晒干,放入缸中贮藏起来。每当我们孩子嘴馋时,母亲就把杂鱼干拿出来用开水浸泡后,放上葱花、姜片、少许糖放在饭锅上进行清蒸。这种清蒸杂鱼干清香松脆,咸味适

中,是佐饭的最美佳肴。说起腌鱼,母亲最拿手的要数腌制酒糟鱼了。进入腊月,母亲就从市场上买回一筐鳊鱼、鲫鱼,搭些细盐,塞入酒糟,放入口小肚大的缸瓮中,上面压上石块,封闭瓮口。半个月后,酒糟鱼发出阵阵清香。每逢贵客上门,或是节假日,母亲就从瓮中捞起两条

酒糟鱼,放入白长瓷盆碗中,加入葱花、姜片等,滴入几滴麻油,放入锅中蒸制二十分钟即可上桌。蒸熟的酒糟鱼,那肉呈枣木红,其色泽即有一种沉醉之美,再有阵阵酒香飘来,芳香四溢,开胃下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些事情早已淡忘。可那咸鱼干、酒糟鱼的清香味儿,飘浮在我的心头,久久不愿离去。



我的作品第一次由手写变成铅字,是在50年前,它得益于群众艺术馆的帮助。那时候,我仅20岁,在崇明乡间一个僻静的公社粮站里工作。因为喜欢在业余时间写一点东西,就经常被县文化馆抽借去参加创作班。记忆中那正是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提倡做好人好事,我写了一篇故事《谁做的好事》,县文化馆把它送到了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那里的辅导老师看了后认为有加工的余地,就要县里带我到市里去改稿。

记得那天我们是乘下午五点的双体船从崇明出发的,到艺术馆已经九点多。其时的群众艺术馆在外白渡桥边上的黄浦路上,即现在的俄罗斯领事馆内。一楼是群艺馆,二楼三楼是上海合唱团。当年我们郊

县的作者去群艺馆不用住旅馆,只要到传达室借一套被子席子到地下室去睡就可以了。第二天,县文化馆的老师带着我,去见了专门搞故事创作的一位叫钱基的老师。钱老师仔细地谈了我的故事,指出了哪些地方要修改,哪个情节要推敲,甚至故事中人物的开相等都一一谈到,我听了大有醍醐灌顶之感。那次和群艺馆的老师相处,让我这个乡下来的青年,确实确实感到了他们对于业余作者的尽心尽力。待了三天,经过钱老师和其他几个老师的帮助,我把故事改好了。回到县里,文化馆把它发表在铅印的文艺材料上,这也算是我踏上业余创作路的开始。可惜的是,这次以后不久,

离开家不远处有一医院,上周散步的时候,听到稚嫩的无比悲痛的哭声,走过去一看,一个女孩刚刚失去母亲。我的心被巨大的悲痛劫持了。我深知,失去母亲对于一个女孩而言,好比天塌了。女孩最大的福分并不是出众的容貌或飞来的白马王子,而在于拥有一位慈爱、睿智的母亲。

母爱

秦文君

朋友家有三千金,她们的母亲是个主治医生。她优雅纤弱,充满仁慈,她鼓励女儿大声说出自己的心愿,她在院子里栽了三棵树,以三个孩子的名字命名;在她们胆怯和孤独时她给她们唱歌。三个女儿无一例外都以为母亲最爱自己,就因为她的鼓励总是那么及时。有一天,她们失去了最爱的母亲,她们家并没有传出那种死了人的悲惨哭喊,三姐妹默默地协助父亲料理了后事,显得十分理智。直到有一天父亲出门去了,姐妹们三个才抱头痛哭了一场,她们怕惹父亲伤心,那种为亲人着想的秉性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母亲留给她们最贵重的遗物——爱和仁慈。母亲的爱有时还能创造奇迹。我认识一位容貌

出众才华横溢的女孩,爱写诗,有点林黛玉式的。就在花季时节,女孩遇上些刺激,突然疯了。她目光呆滞,与亲人们反目成仇,几乎所有人都都摇摇头遗弃了她,唯有她的母亲不肯放弃一线希望。她细心呵护,一连数年,头上的白发一片片地长出。终于有一天,她的女儿开始明白事理,突然开口说了声“谢谢妈妈”。她的母亲一听此话泪目夺眶而出。世上最珍爱我们的往往是母亲,母女间有着息息相通的纽带。因为过于相知,因为母亲爱女心切,也因为女孩子成长期的迷惘,生活中不时有母女纠纷。记得中学时,我时常违抗母亲,觉得她的话有点过时,相比之下还是朋友更亲切。母女俩话不投机,时常不欢而散。直到有一天,我在朋友那碰了壁,才体察到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的厚道还在于每当我走不走运时,她总说:“只要身体好就行,你还可以再开始。”听了这话,我就心安了,踏踏实实地赶路,因为我无论多晚赶路,母亲都会开亮灯等候着我。直到如今,我自己是一个成熟的母亲了,可遇上大事小事,我都不由自主地打电话给母亲。有时母亲外出了,一整天都不在,我会坐立不安。这时,若拨通一个电话听到母亲安详地说一声:“喂。”知她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吕少华 篆刻

平安,我会深深地感恩,心里有爱和亲情,一生足矣。我另一位女友,前不久已从万丈深渊的痛苦中走出。她说以前怕走黑暗的夜路,而现在不怕了,因为在黑夜里会感觉到母亲就在身边,母爱留下的力量无所不在。母亲的爱、亲人的爱像一块永不融化的蜜糖,它们存在心底,只要轻轻地碰触,就会溢出芬芳,时过境迁,许多人和事会淡忘、消逝,唯有母爱可以受用终生。



傻瓜相机

收拾了一上午的书橱,抽屉,翻出了许多年前的东西,回忆也随着这些物件从心间被翻出来。虽然还能依稀记得一些细节,但更多的是一种感觉。像是一个装着时间和空间的盒子,一打开,就跳出了很长一段岁月,但它们已经融在了一起,你无法从中抽出某一个时刻,只能领略糅杂的情绪与回忆。会发现,那些当时觉得无法面对的离别,觉得漫长难熬的日子,觉得幸福满溢的不愿溜走时光,都褪去了浓艳的色彩,像一块印着浅淡的碎花的布,在风中一抖,飘散出阳光雨露留下的淡淡味道。

留着还是扔了

——美的样子 刘昱君

无奈,再大的房间,也装不下所有的物件,每年都在取舍中留下了一部分,扔掉了一部分。虽总是不舍,但是在决定扔掉的一瞬间,又感到一阵轻松,为留下的那些和新放入的那些,感到快乐。心也装不下所有的回忆,时光像海水,冲刷回忆的堤岸,一层一层的沙石被消磨,又有一层一层的涌上来。消磨,就消磨罢,也许早些消磨,便早些轻松。既然装不下,何不多装些快乐。



西班牙科尔多瓦百花巷(油画) 金国明

“文革”开始了,群艺馆被逼迁上了大门。当我再一次与它有联系时,已是“文革”结束后。我自己也因为当年那篇故事比较成功,被县里从粮食部门调到了文化馆。那时,当年那些辅导过我们创作的老师又回到了

带我跨进艺术门槛的引路人

柴焱熊

馆里,他们都已苍老了不少。一见到我们这些业余作者,十分地亲热。记得为了培养新的业余作者,群艺馆当时每年都要十天半月地在郊区开办培训班,举办讲座,请戏剧学院的老师和剧团的编导来授课。馆里的辅导老师天天和我们一起,为一个一个小戏,一只只曲艺,一篇篇故事选题材,谈构

思,费尽了脑汁,花尽了心思。正是在他们的悉心辅导下,正是在他们的精心点拨下,正是在他们的尽心帮助下,许多业余作者的作品才被搬上了舞台,能够在刊物上发表。可以说,没有群众艺术馆的老师,许多业余作者只能永远在艺术的门槛外面徘徊。最难忘的是有一年,为了提高我们县里的业余创作水平,群艺馆里的何其美、吴才康、丁洪生老师在崇明待了半个多月。他们租借来铺盖,吃住在文化馆里,为业余作者举办戏剧曲艺创作班,白天为大家上课,从题材的结构到唱词的写作,从人物的刻画到冲突的设置;夜晚为作者改稿,从唱词的提炼到道白的修饰;从人物的开

相到细节的处理。最终,我们县的群众文艺创作在这一年获得丰收。创作硕果累累,第二年,市里破天荒地把区县的首届曲艺节放在了当时交通甚为不便的崇明举行。时至今日,我虽然已经成为了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会员,我虽然已经退休在家了,我虽然也已先后出版了十多本书,但是我仍然愿意向馆办的刊物《群文世界》投稿,因为群众艺术馆是我创作路上的引路人。群众艺术馆建馆六十周年了。一个甲子的寒寒夏夏见证了它往昔的风风雨雨;六十春秋的朝朝暮暮显现着它如今的枝繁叶茂。

珍惜群众文艺并与此同行的人,明请群艺馆二三事看本栏。

